

基于“崖面使用”的北石窟寺空间格局 演进初探

杨润泽 魏文斌

关键词：北石窟寺 崖面使用 空间格局演进 生成逻辑 北魏至清代

KEYWORDS: North Cave Temple Cliff Us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Generative Logic Northern Wei through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Based on conditions of cliff use, this study reveals layout characteristics and grotto niche patterns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Qing dynasties through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North Cave Temple in Qingyang City, Gansu. This allows for re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over tim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the Northern Wei through the Sui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and from the Song through the Qing Dynasty, corresponding to the stages of inception, prosperity, as well as stagnation and restoration.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generative logic behind formation of the temple's spatial patterns from social, natur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identifying thre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templ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the prime mover,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original cliff surface, and shifting location preferences of builders across different eras.

石窟寺的修建是一项长时间、多工种共同参与的大型营造工程。石窟在开凿和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在崖面上遗留较多遗迹，如斩山、窟檐、栈道、排水等。通过研究这些遗迹，有助于判定洞窟的组合关系和年代分期，揭示石窟寺的历史面貌和营建者的规划理念等。宿白、李裕群、魏正中根据崖面建筑遗迹，分别对云冈、麦积山和龟兹石窟的洞窟组合及年代分期进行研究^[1]。夏立栋通过崖面斩山遗迹，探讨了吐峪沟石窟的窟院营造次第和考古分期^[2]。彭明浩通过斩山遗迹、河谷自然地貌以及同一区域其他石窟特征，推测出榆林窟、云冈石窟山体的原始面

貌^[3]；通过建筑遗迹，复原了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龕和羊头山石窟的窟前建筑，并对窟前空间关系提出新的认识^[4]。

除上述利用崖面遗迹进行研究以外，“崖面使用”也是石窟寺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5]。初师宾和马德分别以麦积山石窟和莫高窟为例，对“崖面使用”情况展开探讨，但二人的论述重点略有不同。前者注重空间层次，通过分析麦积山窟龕的分布和组合，阐释影响赞助人和营建者选择崖面的因素^[6]；后者注重时代层次^[7]，通过解构历代窟龕布局的方式，还原莫高窟崖面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8]。基于此，在利用崖面遗迹进行

作者：杨润泽，兰州市，730020，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魏文斌，兰州市，730020，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

研究时，结合“崖面使用”情况，将每一时期的窟龕从石窟整体中提取出来，可以得知历代崖面空间格局的演进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和崖面遗迹的空间关系，有助于探知石窟所在山体的原始面貌，同时揭示赞助人和营建者的选址意图。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南25公里，地处蒲河、茹河交汇处，背倚覆钟山。该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时期，后经西魏至明清时期的持续营建和重修，最终形成陇东地区营造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石窟遗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已通过窟龕形制、造像风格、纪年题铭研究对北石窟寺窟龕的年代序列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9]，但现有研究更注重洞窟造像的形制分析，对外部遗迹关注较少，缺乏对北石窟寺整体营建规划、空间演进的把握。本文通过对北石窟寺的实地调查，结合“崖面使用”情况，重构北石窟寺营建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对其演进规律的生成逻辑进行探讨，以期对北石窟寺整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北石窟寺空间格局的历时特征

北石窟寺有编号的窟龕共294个，大小窟龕紧密排列，集中分布在长120、高20米的覆钟山底部崖面上（图一）。其中，有明确纪年的窟龕仅5个，包括第165窟（公元509年）、第171窟（公元656年）、第210窟（公元660年）、第32窟（公元692年）、第257窟（公元695年），其余窟龕皆是依据造

像特征、窟龕形制等判断的相对年代。段文杰在1974年调查北石窟后，对部分洞窟的年代进行了推断^[10]。宋文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北石窟寺洞窟的年代分期和造像风格^[11]。但部分窟龕由于风化严重，造像模糊，特征不明显，仍未确定年代^[12]。现根据《北石窟寺内容总录》中窟龕的年代划分^[13]，通过分析“崖面使用”情况以解构时代层次的方法，分析北石窟寺空间格局的历时特征。

（一）第一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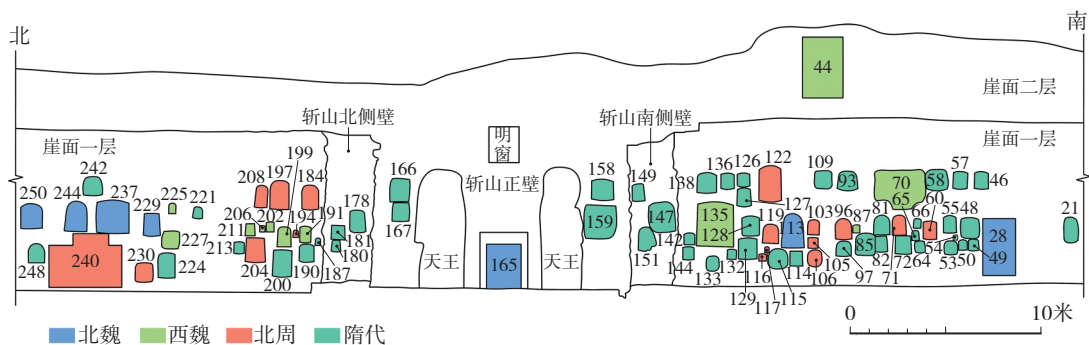
这一阶段的时代为北魏至隋代。北魏时期的北石窟寺开凿有窟龕7个，分布在长48、高4.7米的崖面上。第165窟位于此段崖面的中心位置，是北石窟寺营建规模最大的洞窟。其斩山正壁宽14、高11、进深1.5~2米。其余窟龕分布于第165窟两侧，北侧并列4个窟龕，南侧零散分布2个窟龕。这一时期中小型窟龕的开凿区域并不完全集中，多位于崖面中部悬空位置，且距中心窟第165窟的距离较远（图二）。

西魏时期的窟龕现存11个，分布在长37.8、高13.6米的崖面之间。大部分窟龕与北魏时期窟龕的高度基本相同，同样位于崖面中部悬空位置。个别窟龕位置较高，如第70窟和第44窟。整体来说，这一时期是在北魏时期窟龕布局范围的基础上向内、向上进行开凿，并逐渐向第165窟靠拢，北侧崖面均为中小型浅龕，南侧窟龕规模较大。

北周时期的窟龕现存17个，分布在长42、高6米的崖面上。这一时期的窟龕延续



图一 北石窟寺崖面及窟龕分布图
（此图由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提供）



图二 北魏至隋代北石窟寺崖面窟龕分布图

了西魏时期的布局模式，同样在北魏时期窟龕范围内侧进行开凿。规模最大的第240窟，位于北侧崖面底部。小型龕的布局规律与西魏时期相同，分布在崖面中部，但集中于南侧崖面，包括第60、96、103龕。中型龕的位置相较北魏、西魏时期有所升高，集中于崖面上部，如第122、184、197龕。

隋代窟龕现存50个，其中第21龕开凿于北魏时期第28窟南侧，使崖面延长至52米，整体高度基本与西魏、北周时期的窟龕相同。大量窟龕集中分布于第165窟南侧崖面，相互之间连接紧密，排列规整，呈片状分布于早期窟龕周围。第165窟北侧崖面窟龕分布散乱，且数量较少，未形成明显的时代区域。从这一时期起，部分窟龕占据第165窟的斩山正壁及侧壁，打破了该窟外立面的完整性。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是北石窟寺崖面的开创阶段。在北魏至隋代这两百多年里，北石窟寺崖面的开凿范围基本是以北魏第28窟和第250龕为垂直界限，在此范围内逐渐营建出层次丰富的窟龕布局序列，大小窟龕在崖面上高低错落，散乱分布，形成了以第165窟为中心、向两侧不断发展的空间布局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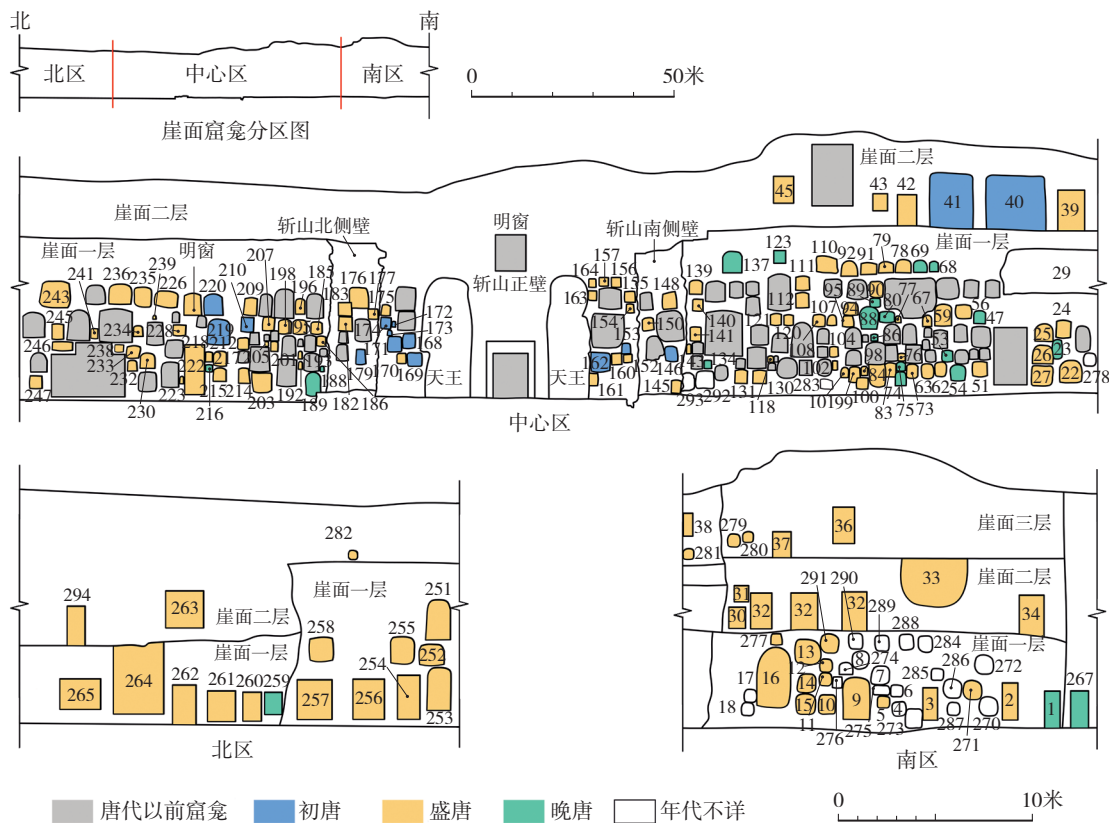
北石窟寺北魏至隋代的窟龕大多开凿于距现地面2.5米以上，在此高度进行施工，应无需修建整体的通行栈道，赞助人和营建者多以窟前空地为活动空间。但也有例外，如第70窟距现地面4.1米，窟宽4、进深5.2、高6.1米，是西魏时期的中心柱式大窟。如此

规模的洞窟必然可以满足僧众入窟礼拜的需求，而其位置较高，无法直接到达，应在下方设有进入的栈道或扶梯。第44龕为圆拱顶敞口大龕，位于崖面二层，说明此时应有可以通向上层的通行踏道。从崖面现有遗迹来看，北魏时期第28窟南侧有数个石阶踏步和脚窝，应是由此登临崖面二层。

（二）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代为唐代。由于唐代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北石窟寺窟龕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共凿窟龕200余个，约占所有窟龕总数的三分之二。北石窟寺整体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部分崖面已被第一阶段的窟龕占用，在中部崖面不足的情况下，开始在先代窟区的崖面上“见缝插针”，并向南、北两侧崖面进行扩延（图三）。这一阶段是北石窟寺崖面的兴盛阶段。

初唐时期延续上一阶段在第28窟和第250龕范围内进行开凿的布局模式，窟龕多集中在第165窟斩山正壁和侧壁，另在中心区南侧二层崖面开凿2个敞口大龕（第40、41龕），可能是一层崖面空间不足，借助北周时期的通行踏道上至二层崖面进行开凿。盛唐时期纵向扩展了第165窟南侧一层崖面，如第78、79、91、92、110等龕位于第一阶段窟龕上方，第62、63、73、74等龕位于崖面底部。同时还新开辟了南区三层阶梯状崖面和北区二层崖面^[14]，两区凿出较多大型龕及洞窟，使营建活动在崖面上全面铺开，直至崖面达到饱和。至晚唐时期，所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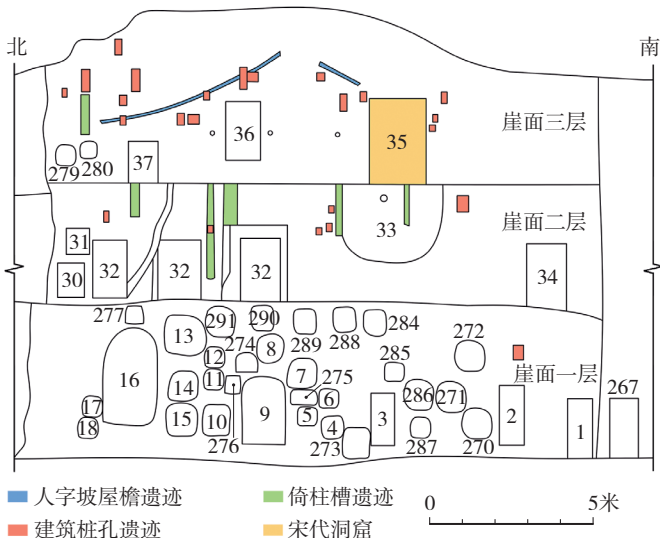


图三 唐代北石窟寺崖面窟龕分布图
 (部分窟龕位于崖面侧壁, 未能在图中表现, 如第19、20龕位于第17、18龕北侧崖壁, 第266龕位于第265龕北侧北面崖壁, 第268、269龕位于第267窟北侧北面崖壁等)

崖面不多,“见缝插针”现象更为明显。现存南区端头的第1窟和第267窟规模较大,小龕则多分布崖面最上层或最下层,如第54、68、123、137龕等。

这一阶段的北石窟寺不仅以开凿窟龕为主,还在窟前修筑大量木构建筑,使北石窟寺的空间布局向窟前延伸。从崖面遗迹可以看出,南区第三层崖面上方遗留“人”字形沟槽,该遗迹应属窟前建筑的屋顶坡面,两坡下方各有一组建筑桩孔遗迹,第二层崖面有较多倚柱槽(图四),第一、二层地面有较大柱础遗迹。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1974年清理窟院时,在第165窟窟门向南30米处,发现地下有东西向的夯土层,因此

推测此处唐代可能有过隔墙,将北石窟寺分为南、北两个院落^[15]。窟门向南30米为盛唐时期新开辟的南区崖面,根据这些复杂的



图四 崖面南区第二、三层建筑遗迹分布图

建筑遗迹和东西向夯土层来看，此区域可能为六椽栝的三层楼阁式建筑。其中，第三层第35窟为宋代开凿，其窟门打破“人”字形屋顶坡面，因此该区域的建筑遗存应早于第35窟。

随着北石窟寺空间格局的改变，僧俗、信众在这一公共场所中的行为活动、观览模式和第一阶段相比也发生了变化。盛唐时期在南区第三层开凿洞窟，同时也在第165窟南侧第二层开凿数个大龕，这些窟龕底部遗留有连续的斩山通道凿痕，说明是经统一修凿的二层平台。随着南区第三层与第二层崖面的相互连接，僧俗、信众可以从崖面南端沿石阶而上（图五），这种行进路线改变了以往沿第28窟南侧岩体踏步和脚窝登临第二层的前例。北区第259~261窟上方的崖面有踏步遗迹，僧众应曾在此处架设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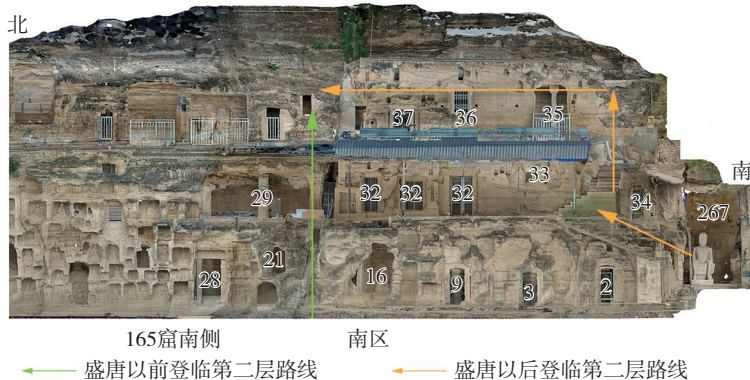
通过石阶行至第263、294窟进行礼佛活动（图六）。

另外，南区第一层崖面的众多小龕造像受自然因素影响损毁严重，已无法判断年代^[16]。根据这一时期窟龕在崖面形成的时代层次来看，可以将其年代上限定为盛唐时期。部分小龕打破第3、9窟的边缘，因此年代不会早于这两窟。这一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分析“崖面使用”情况对窟龕营造年代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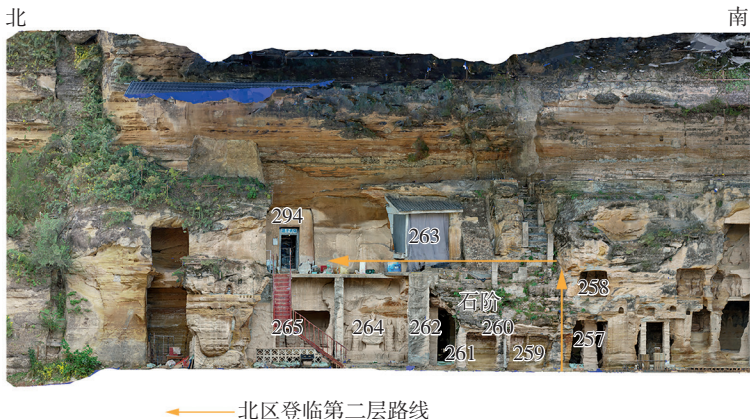
（三）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代为宋至清代。在这九百多年里，新凿修的洞窟数量不多，主要营建活动是补凿及重修龕像，并在崖前修建大规模的窟檐、游廊、栈道、殿堂等木构建筑^[17]。宋代在南区第三层开凿第35窟，在第165窟明窗内雕凿罗汉像，在第222窟甬道两壁雕文殊、普贤菩萨像。明清时期对先代窟龕、造像不断重修，将第294窟改建为“娘娘庙”，同时伴随有不同规模的维修、建寺活动。现可通过寺院中的碑刻、游人题记和僧人题记等窥探寺院空间格局的蛛丝马迹。

自宋代起，北石窟寺窟龕营建活动有所减少，但补修、重装和礼拜等佛事活动仍然兴盛，官员、文人和民众等将北石窟寺作为游览圣地^[18]。其中绍圣元年（1094年）所立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孟兰会记》碑记载了当时北石窟寺孟兰盆节的盛况，其中“……翌朝率巡检侍禁李德监、酒殿直李尧臣、主簿董宗道，因出观稼，遂至精宇，瞻顶七俱胝



图五 崖面南区登临第二层路线



图六 崖面北区登临第二层路线

如来……”^[19]说明众人可至“精宇”瞻仰、礼拜七佛。2005年，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加固工程中，于窟前做基岩排水盲沟和第165窟顶部修造排水明渠时，在明窗上部、窟前地面发掘出大量宋代大青砖^[20]。根据文献及实物资料说明第165窟在这一时期修建有与崖面相接、具有屋檐及椽瓦的木构建筑。从明窗内所遗留的“陕西西路转运副使任侗，驰驿自庆阳回，乃来游礼石窟寺宝龕，时正隆庚辰（1160年）十月五日，题此以志其岁月耳”^[21]游人题记，可知当时在明窗底部有连接南、北两侧二层的木构平台，以便游人进出明窗，由此推断第165窟的窟前建筑应为二层楼阁式。

明代由于皇权的强化、僧伽组织的变革以及士绅阶层的支持等多重原因，佛教开始逐渐向世俗化转变。北石窟寺在此时代背景下，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民间信仰成分开始上升，成为文人雅士游览会友、黎民百姓集会交易以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的场所^[22]。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立祈雨感应碑，碑阴阴线刻游人诗文六首，从最后一首诗中“稽古□傍，观游屋楼”的“屋楼”可知，此时窟区寺院内存有楼阁式建筑。碑阳“……瞿云神，幻移木□，宇飞来，于是乎信非人所能也……”^[23]描绘了寺院内殿宇的宏伟规模及壮观程度。

北石窟寺现存较多清代碑刻和题记，记载了寺院的历史沿革，以及新建、重修寺院内建筑、造像的活动事迹。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大清碑记》载：“陕西省□□□（平凉府）镇原县东有寺，内古有□□□□□□□□为有关圣帝君、二诸神。共修山门，万善同归”^[24]。此次修葺活动主要是维修山门，并增置（或重修）关公和二郎神的塑像。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记载如下^[25]。

元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泾原节度使奚侯创建，其泉石清幽，境况

奇幻，龕像宏壮，阁楼严峻，似有非人力所为者。迄今历千有余年，代有补葺，而无所考验。惟有宋时绍圣初年（1094年）重修之绩记于古碑，然断蚀磨灭十亡八九□□（矣）。旧有明季，所增修诸庙宇。至本朝康熙年间，更经重演。奈历年又久，墙倾壁圯，址颓垣覆。神若有，难安其舍。社中信士不敢坐视其残毁，遂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咸发虔念，舍金捐资，庀工修理，移基换像，作庙于大佛殿前。中置观音大士、左关帝、右二郎，旁对显圣、龙王，阅数载而功告成焉，一时栋宇崇隆，椽桷巍峨，殿阁神□，庙貌森如。荒凉之基焕然一新，堪为千古之胜概。

此碑记录了自北魏创建窟寺至康熙年间修补窟寺的大概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于大佛洞前修建献殿，以及这一时期窟院屋檐、椽桷巍峨的辉煌景象。

献殿遗址位于第165窟门前7.15米处，台基面宽8.67、进深12.26、高0.42米。献殿两侧1.3米处有钟楼、鼓楼的房基遗迹，其中南侧钟楼房基宽4.4、进深3.65米，北侧鼓楼房基宽3.65、进深3.65米^[26]。从献殿和钟、鼓楼，以及第165窟的空间关系来看，这4座建筑共同构成寺院核心，形成传统寺院的中轴线空间布局模式^[27]。另外，献殿前方15.65米处有清代光绪年间所建戏楼1座，面宽6.7、进深6.7、高约5.9米，其与献殿及第165窟处于同一纵列，有学者认为其修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8]。根据传统的寺院格局，推测《大清碑记》中所修山门的位置，应在戏台前方不远的地方（图七）。

综上所述，第三阶段为北石窟寺崖面的停滞、维持和修整阶段。这一阶段北石窟寺的空间格局，在唐代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向地面延伸，构建了完整、程式化的寺院建筑



图七 北石窟寺清代寺院局部遗址分布（西→东）

群，形成地面建筑与洞窟相结合的混合式中轴线布局。石窟寺发展到这一阶段，开窟造像活动逐渐消歇，由于洞窟功能的日益单一，石窟逐步变为纯粹的游览、观像场所，而地面寺院建筑承担了更多集会、礼佛、居住等功能^[29]。

二、北石窟寺空间格局的生成逻辑

北石窟寺在5~14世纪间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崖面窟龕空间布局的演进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并呈现出特定的内在规律。现尝试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观念因素着手，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分析。

（一）社会因素：历史地位的推动

北石窟寺地处陇东地区核心地带，其西接河西走廊，东傍长安，北依萧关，是丝绸之路通往西段的咽喉，在古代人文史、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石窟寺窟前的雍州道、高平道和泾州道等数条古道将之与周围州县和城池相连接，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佛教艺术能在此长期兴盛，从而奠定北石窟寺从创建、发展到兴盛的空间格局。

由于陇东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这一区域的经营和控制，多选用朝廷重臣经略此地，北魏时期奚康生、元祐和陆希道先后担任泾州刺史^[30]。在北魏统治者崇信佛教的时代背景下，陇东地

区作为丝绸之路进入长安的要道，自然成为佛教发展的重点地区和传播中心。其所在的泾河流域沿线保留了众多的石窟寺遗址，形成三大石窟群：一是分别以北石窟寺、南石窟寺为中心的大型石窟群；二是以平定川为中心的中小型石窟群，如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马勺场石窟等；三是分别以石拱寺和云崖寺为中心的小型石窟群。其中北石窟寺第165窟和南石窟寺第1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造像内容及题材较为相似，皆为北魏大将奚康生主持开凿。奚康生出身于拓跋贵族，在魏宣武帝时期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奚康生镇压泾州沙门刘慧汪起义后，在此开窟，或是借用佛教的力量来“教化”民众，也可能是他“放下屠刀”的诚意，或是为讨好胡太后^[31]。无论何种原因，第165窟的开凿对北石窟寺空间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期窟龕以该窟为中心向四周开凿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西魏至隋代，陇东地区内建置多变，虽然历朝统治时间较短，但佛教仍是统治者用来安抚民众的重要手段。陇东地区除北石窟外，虽未发现这一时期开凿的其他石窟遗存，但1969年在泾州的北周宝宁寺遗址中发现了佛舍利子，还有北周比丘慧明造佛舍利套函，隋文帝在泾川敕建大兴国寺，建舍利塔和地宫，用石函供奉佛祖舍利，以及大云寺出土隋代造像及舍利，都能说明陇东地区在这一时期佛教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北石窟寺位于数条交通要道的中心，来往人员众多，僧众在前期窟龕的基础上继续开凿石窟，使其成为陇东地区在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佛教活动场所。

唐代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都曾大力倡佛。北石窟寺第171窟的发愿文中提及“□□皇帝□□□四海□兴”^[32]，是信徒对唐朝皇帝的感恩戴德，祈祷皇业昌盛、四海振兴。陇东地区

石窟寺继北朝之后持续发展，数量迅速增加，分布广泛，小河湾、莲花寺、万山寺等石窟皆在此阶段开凿。北石窟寺也迎来了空前的鼎盛时期，并由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赞助人和营建者，在北魏至隋代窟龕的基础上开辟南、北两区崖面。南区第二层第32窟正壁大龕南壁上阴刻题记一方“大周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岁次……涇州临泾县令杨元裕敬造阿弥佉像一铺……”^[33]，该窟高2.5、宽13.2、深6.5米，平面形制为不规则长方形，应是相继开凿，后期不断改造而成。北区第257窟为“惟大周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宁州丰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界苍生……”所造^[34]，该窟宽4.7、进深4.1、高3.1米，窟内原作七佛。这两窟规模较大，分别为临泾县（今镇原县东南）、丰义县（今彭原县西南）县令开凿，他们不再局限于中心区的天然崖面，而是根据自身的社会身份和财力状况扩大了北石窟寺的规模。除此之外，从斩山工程量上，也可看出盛唐时期北石窟寺的重要地位。南区崖面平整，是经过有规划、统一的斩山工程后形成的垂直崖面，共有三层。由下至上第一层向内斩山2.5、长18.9米，现有洞窟4座，四周布满中、小型龕；第二层向内斩山2.6、长16米，原本4窟，后期隔墙被打破，形成一个窟；第三层向内斩山4.8、长1.4米，唐代洞窟2座。在坡状山体上斩切出直壁以开凿石窟，是一项较为费力的工程。而北石窟寺南区斩山工程量如此之大，应非普通民众或某一个洞窟的赞助人与营建者所为，而是由较有财力的群体统一规划、共同出资、合力开凿而成。

（二）自然因素：原始崖面的限制

北魏至隋代，北石窟寺空间格局的生成因素与原始崖面的形态密切相关。但经过一千多年的营建活动，北石窟寺所在山体的崖面已发生巨大改变，因此要先对其进行还原，再结合遗迹现象论述成因。根据地貌学

研究，一般在同一流域内，由于河水的侵蚀作用同时发生，河谷两侧的山体会形成相同的地貌特征。北石窟寺所在的岩体整体属于白垩系砂岩地层，水平层理发育，因此与石窟相邻未经人类大型工程改造的山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山体的原始情况^[35]。

北石窟寺所在的覆钟山属于黄土梁峁地貌，其山体形似倒扣的钟，相对高度为250多米，山脉呈南北走向。此地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西缘的构造单元上，地块基本上处于长期稳定状态，通常以整体上升与沉降的垂直运动为主，地层产状平缓^[36]。因此，覆钟山顶中部平坦，四周为梯田式断崖，山体中部坡度较陡，坡面有数条经冲蚀形成的不规则纵向浅沟，底部与地面平缓相接，部分区域形成断崖，露出基岩。其西北端、东南端分别以深切沟谷的形态与大坡山、鸡头山相隔。山前的蒲河自北向南经寺门前流过，茹河自西向东在石窟的南侧汇入蒲河，两侧山体底缘经河流的侵蚀作用，形成了阶地断崖。北石窟寺窟群位于蒲河东岸二层阶地上，原始崖面应与大坡山、鸡头山相同，为天然断崖。

北石窟寺窟群北端25米处的山体地貌未经人工修造，可看出其山体的原始面貌。这一区域的山体上方有明显的两层阶地，第一、二层皆为天然形成的断崖，崖面较为平整，高16米。第二层底部与第一层崖面交界处为自然缓坡，缓坡上方同样为平整的断崖（图八）。由此可知北石窟寺窟群利用了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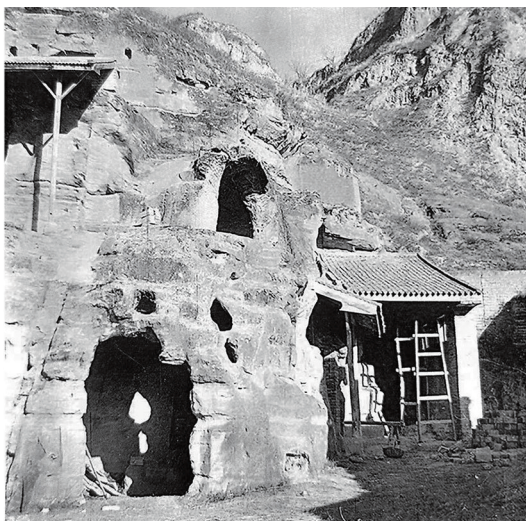


图八 北石窟寺北端山体（西北→东南）

然形成的垂直壁面，第二层也是借助自然缓坡平台进行窟龕开凿活动。在断面小平台上开凿窟龕，不但降低了施工难度，也便于僧众登临石窟。北石窟寺南端岩体较为破碎，经冲蚀后出现多组纵向深切沟谷，崖面在此区域形成长25、宽31米的凹陷，并整体向东转折（图九）。北石窟寺的营造工程在此区域停止，很有可能是因为南侧崖面状况较差，不利于开凿。

另外，从崖面范围与石窟规模是否匹配这一角度，也可以判断崖面是天然断崖还是经人工斩山形成。一般而言，开凿石窟时的斩山“是一大工程，特别是大型洞窟的斩山，往往要耗时数年。因此，所斩的崖面范围是配合洞窟开凿的，……如果洞窟崖面范围与其上开凿的洞窟规模不匹配，且没有明显的斩山侧壁，则说明洞窟当利用自然崖面开凿”^[37]。北石窟寺北魏至隋代的窟龕，除了第165窟向内斩山约2米，其余中、小型窟龕分布散乱、大小不一，前后经历数个朝代，亦可说明营建者和赞助人没有经过统一规划且利用了自然崖面。

从北石窟寺崖面遗迹现象看，第28窟南侧山体向西折出2.5米，且底部遗留宽1.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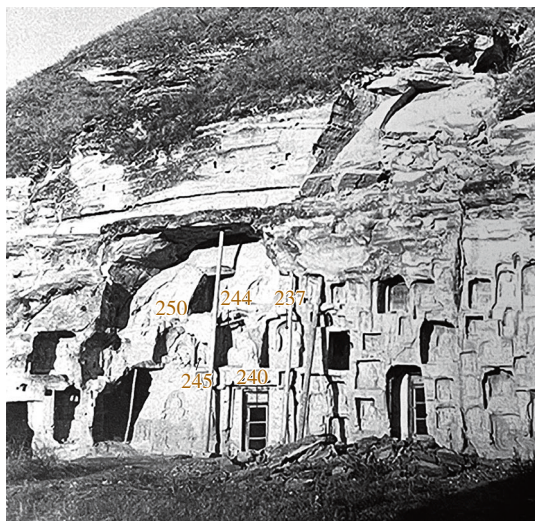


图九 北石窟寺南端山体（西→东）
（引自崔惠萍：《北石窟寺旧影》第1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年）



图一〇 北石窟寺南区底部斩山平台遗迹（西北→东南）

高0.32~0.58米的斩山平台（图一〇）。将崖面上部与斩山平台进行连接，可以大致反映出此区域原始山体的走向，其原始山体应为缓坡，同时说明这一区域山体是经大规模、统一的斩山工程后形成的垂直崖面。第250窟北侧崖面向西折出3.2米，其山体底部没有岩体平台，该区域崖面同样为突出的坡状山体（图一一）。由此可知，北魏至隋代，南侧第28窟至北侧第250窟的区域内崖体底缘平齐无转折，为垂直断崖。此区域以



图一一 北石窟寺北区崖面（东南→西北）
（引自崔惠萍：《北石窟寺旧影》第1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年）

外的山体存在自然的弧状曲折，对开凿窟龕有障碍。

综上所述，北石窟寺在北魏至初唐时期，主要利用河水冲蚀形成的自然断崖，进行无规律的窟龕开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原始山体自然崖面的限制，才集中在中心区域进行开凿。而至盛唐时期，中心区域的崖面位置所剩不多，便开始向南、北区坡状山体上进行统一、大规模的斩山工程，并在所形成的垂直壁面上开凿洞窟。

（三）观念因素：选址意图的转变

在北石窟寺兴建时期，虽然前往的人群中包括观瞻的僧侣、信众，但更多的是当地亲身参与窟龕营建和佛事活动的奉献者和实践者。赞助人和营建者以自己的钱财、影响力和劳动力，年复一年地扩充崖面的窟龕规模，他们会根据自己心中的意愿选择理想的崖面区域开凿窟龕，根据“崖面使用”情况来看，不同时期的赞助人和营建者对崖面选择标准有所不同。

北魏时期的窟龕开凿区域并不完全集中，且距第165窟较远，北侧中型龕距其5.7~9米，南侧第113龕和第28窟距其5.9~17米。但这一现象在下一时期发生变化。西魏时期的第135、191、199龕皆邻近第165窟开凿，到了隋代更是直接打破第165窟斩山正、侧壁进行开龕。出现这种窟龕布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或许可以假设在相邻或不远处开龕的，其赞助人和营建者应具有某种社会关联性，或许属于同一体系，而未跟随已存在的洞窟布局序列，选择相反的方向开凿，很可能是对自我身份的考虑^[38]。北魏时期窟龕的赞助人与营建者远离第165窟，可能出于对北魏大将奚康生身份及地位的考虑，为回避而选择在距离较远的崖面开凿。西魏、北周时期或是因为朝代的变更，使后人对前期窟主身份、地位的考量有所减弱，隋代则已完全无需考虑。

另外，北魏至西魏时期除了大、中型

洞窟开凿于崖面底部以外，其余大、中型龕皆位于崖面高2.5~4.6米的中部悬空位置。这样的营建模式与先利用底部崖面进行洞窟开凿的石窟不同。如龙门石窟奉先寺北侧洞窟，大体上为较早建造的石窟占据崖面下层，后来者建在较高处^[39]。为何不选择在较易登临、无需修建脚手架或施工平台的低处开凿，以便节省人工力和财力？这或许是赞助人和营建者认为崖面中部是较为优越的窟龕开凿范围：一是山体上部有较厚的岩体，可以防止泥沙、树木等对洞窟的破坏和阻挡，开窟较为安全；二是观者举首瞻仰时，视线较为开阔，且角度契合，是理想的观摩、礼拜位置，所以此阶段大部分窟龕选择了一定高度以上的崖面。北周时期，大、中型龕的位置升高至4.3~6.1米。这一时期崖面整体空余仍然较多，可以继续选择与前期同一高度的崖面进行开凿，但大、中型龕的位置有所升高，或许是因为赞助人和营建者对“优越崖面”的选择观念发生了变化。

北周至隋代，大部分窟龕皆开凿于第165窟南侧崖面，形成如此布局很有可能是工匠对岩体的牢固性有所判断。1920年，北石窟寺遭遇了宁夏海源地震的严重冲击，覆钟山崖体滑坡，致使第165窟北侧崖面坍塌严重，较多窟龕残毁，而南侧完好无损，或许是古代工匠在开凿窟龕及造像时，勘察了北石窟寺北侧石质的具体情况，因崖面石质条件而有所取舍。

唐至明清时期，北石窟寺在崖面上修建窟前建筑，遮覆前期窟龕的外立面，改变了外部景观空间，形成有遮檐的半敞型或全遮型空间。这种空间形式的转变影响了信众观摩、礼拜的视觉感及体验感，由露天空间直接入窟转为经檐下过渡后再入窟，形成有层次的殿阁外貌与窟内空间。此类利用已有石窟或新凿石窟，与地面建筑组成混合式佛寺的现象，在中国石窟寺发展历程中较为普遍，并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40]。如重庆江津

石佛寺^[41]、莫高窟第96窟^[42]、炳灵寺第171窟^[43]、巩义第4窟^[44]等。这一变化的产生,表明时人对石窟寺窟龕营建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应是出于人们对宗教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寺院崇拜超过石窟崇拜^[45]。

三、结 语

目前,北石窟寺尚未进行过完整的考古发掘,对寺院布局情况知之甚少,因此只能根据崖面现状和文献记载作较为粗浅的探讨。北石窟寺虽不似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留存有众多题记和历史记载,缺乏文献资料的支撑,无法得知大部分赞助人和营建者的详细姓名和身份,但根据石窟本身的遗存现象、视觉内涵以及空间变化,仍然可以获知不同时代的出资者、营建者、观览者等对石窟外部景观视觉感受的变化。

对北石窟寺空间格局演进特征及其生成逻辑进行探讨,有助于了解最初选址时自然环境、施工条件以及人为规划对开凿营建的作用。除洞窟本体外,石窟所在的崖体环境是石窟寺院空间营造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探知石窟原始面貌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建构和讲述北石窟寺的营建历史。同时为与北石窟寺类似、没有遗留大量文字记载的其他中小型石窟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完善石窟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后若有条件进行窟前遗址的考古发掘,注意地面遗迹及相关基址的清理,即可为空间格局的演进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资料,同时也能深化对北石窟寺营造历程的整体认识。

注 释

- [1] a.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b.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c.李裕群:《麦积山石窟东崖的崩塌与隋代洞

窟判定》,《考古》2013年第2期。

- d.[意]魏正中:《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2] 夏立栋:《吐峪沟石窟的斩山崖面区段与遗址考古分期》,《考古》2021年第11期。
- [3] 彭明浩:《榆林窟原始崖面初探》,《美术研究》2018年第6期;《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文物出版社,2017年。
- [4] a.彭明浩、李若水:《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龕唐代的补凿与加建》,《考古》2020年第2期。
b.彭明浩:《山西高平市羊头山石窟窟檐建筑遗迹的调查与研究》,《考古》2023年第1期。
- [5] “崖面使用”是指赞助人和营建者在开凿洞窟时,对崖面的主观选择和利用。在洞窟营建之前,赞助人和营造者首先会对崖面位置、面积大小及石质优劣等情况进行考量,然后选择恰当区域开始营建。由于受斩修崖面、开辟道路等施工条件的限制,通常同一时期的窟龕多集中在邻近区域。因此同一石窟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窟龕布局规律和时代层次特征,可以借此推断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和营造时代。具体参见以下研究。
a.初师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b.马德:《莫高窟崖面使用刍议》,《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 [6] 同[5]a。
- [7] 时代层次是指“某几个、某一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窟,在特定的布局情况下,由于开凿时间(或时代)有先后的差别,遗留在崖面或洞窟内的痕迹……这种层次不是文化地层上下叠压的关系,而是同一崖面空间的不同位置”。参见注释[5]a。
- [8]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50~16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 [9] a.宋文玉:《北石窟寺唐代窟龕及其造像》,《丝绸之路》1999年学术专辑。
b.刘治立:《北石窟造像类型及其佛教文化底蕴》,《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 c.黄文智：《陇东地区南、北石窟寺北朝窟龕佛像造型分析》，《艺术探索》2023年第1期。
- d.詹社红、米万忠：《北石窟寺历代题记辑录》，《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
- e.张宝玺：《庆阳北石窟几则唐代造像铭记》，《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 [10] 参见吴正科：《段文杰先生对北石窟寺文物的断代——从张鲁章先生笔记中整理》，《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
- [11] 宋文玉：《概述》，见《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
- [12] 如第4、6~8、17、18、23、29、33、34、47、52、61、74、75、77、86、88、99、124、125、134、137、188、189、216、219、239、249、259、270、272~276、278、283~290、292、293龕。
- [13]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15~244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14] 为方便叙述，将北石窟寺崖面分为三个区域，北魏至隋代开凿的崖面为中心区，盛唐时期向南侧扩延的崖面为南区，向北侧扩延的崖面为北区。
- [15] 同[11]。
- [16] 如第2、4、6~8、17、18、270、272、274~276、278、283~290、292、293龕。
- [17] 詹社红：《北石窟寺窟前木构建筑探索》，《丝绸之路》2012年第8期。
- [18] a.刘治立：《宋金时期的北石窟寺》，《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b.宋文玉、刘治立：《北石窟寺宋金游人题记赏析》，《丝绸之路·文论》2003年总第7期。
- [19]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260页。本文引用此书中的碑刻、题记录文，部分断句、标点与书中原文不同，是笔者据实地调查原物后进行的调整。
- [20]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65页。
- [21]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163页。
- [22] 刘治立：《明清时期的北石窟寺》，《陇东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 [23]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261、262页。
- [24]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263页。经实地调查隐约可见“平凉府”三字。
- [25]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263~265页。
- [26]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269页。
- [27] 范培松：《中国寺院形制及布局特点》，《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2期。
- [28] 柴慧霞：《甘肃庆阳北石窟寺戏台考述》，《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
- [29] 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第1615~222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 [30] 刘治立：《泾河上游石窟文化的地理环境概论——以北石窟寺为中心》，《陇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 [31] 木十戊：《奚康生与南、北石窟寺》，《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
- [32]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166页。
- [33]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91页。
- [34]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第225页。
- [35] 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第46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 [36] 吴正科：《庆阳北石窟寺区域历史文化遗存概述》，《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4期。
- [37] 同[35]。
- [38] [美]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第67~9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 [39] 季爱民、焦建辉：《李义琛家族的石窟营建与洛阳生活》，《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8期。
- [40] 陈晶鑫、李飞：《试论川东渝西地区与杭州地区五代至宋地面建筑与石窟混合式佛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3期。
- [4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江津区文物管理所：《重庆江津区石佛寺遗址宋代寺院建筑遗存考古发掘简报》，《西南文物考古》2023年第1期。
- [42] 周真如：《筑地构天：敦煌莫高窟窟前建筑景观》，《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 [43] 石劲松、王玲秀：《炳灵寺第171龕唐代大佛史事钩沉》，《敦煌研究》2012年第4期。
- [44] 彭明浩：《巩义石窟窟檐建筑遗迹及其年代》，《文物》2019年第12期。
- [45] 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责任编辑 李 朵)